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以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例

贺莉¹, 张亚茹²

(1.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闵行 200240; 2.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治理中的核心。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应然”层面的二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的整合分析。以某国有企业推动的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个案, 关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步共举、同向发力的“实然”层面。开发了思想建党效果与制度治党效果测量量表, 提出基于党员个体认知-情感-行为互动模式下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结合点。研究表明, 党员对以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认可度较高, 不同性别、年龄、党龄阶段和是否担任党内职务对效果评价有相助影响, 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不影响党员的评价。研究采用相关分析方法验证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步共举、同向发力。

[关键词] 思想建党; 制度治党; 效果; 同向发力; 实证研究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20.04.008

[中图分类号] D43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0)04-040-07

自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制度治党”, 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步共举、同向发力成为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阐释性研究尝试回答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怎样做才能实现同步共举、同向发力的“应然”问题。也有研究通过对实证研究方法, 以基层党组织^[1]、党校系统^[2]、市县级城市机关工作人员^[3]、国有企业^[4]为研究对象, 回答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实然”问题。基于对“实然”状况把握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推动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些年, 宏观层面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效果有目共睹^[5], 但对二者同向发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总的来说, 影响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外部环境、基层党组织系统内部和党员个人。准确地识别影响因素、分析影响机制是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的前提和基础。从宏观上来看, 中国共产党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是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和当下的工作趋势,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制度治党各项举措, 对于任何一个基层党组织来说, 都是日常工

作的应有之意; 在中观层面, 基层党组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创新层出不穷; 但是微观层面, 党员个体认知、行为改变状况堪忧^[6]。

一些国有企业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非常显著的实践探索, 普遍进行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着相对清晰的制度治党实施起始时间节点的案例, 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举措及其效果。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对近些年以“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实践予以呈现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 在此基础上, 回应理论并提出改进策略。

一、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一) 制度治党举措对党员的影响

制度治党是一种政党治理形态, 是政党运用制度手段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管理和约束并使其遵从党内法规、保持对党忠诚的治理过程。^[7]制度治党包含两个基本维度——静态的制度规范和动态的制度治理。无论是静态的制度规范还是动态的制度治理, 都为个体互动提供约束条件和行为规范^[8], 减少系统不确定性。组织通过对个体行为的价值评估并予以奖励或惩罚而构建秩序^[9], 但组织成员往往会

[投稿日期] 2020-09-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18BKS105)。

[作者简介] 贺莉(1978-), 女, 陕西绥德人, 副教授,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内法规制度宣传教育。

表现出拒绝被控制的特性。^[10]

一方面,制度治党除了关注制度对个体的约束以及组织的能动性,还要关注制度执行背后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组织文化^[1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的前提下,党员遵从制度规范就不是简单的照章行事,既包含了思想上的能动性,也包含行动上的参与度;表现为党员愿意参加党的组织的活动,与组织文化、组织活动保持一定程度的融合。

另一方面,制度提升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之一是通过为组织成员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而提升组织绩效^[12]。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为国有企业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支持提供了依据,通过在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成立党组织,再经由党组织对企业的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培训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借助党务工作平台培养、选拔干部,提升国有企业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因此,对于基层党员来说,对制度治党的认同包含有“获得感”的含义,即从党的制度建设中获得培训、学习的机会从而提升自我。

基于上述分析,在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步推进、同向发力的整体框架下,制度治党的有效性的可以从党员的价值感、获得感和融合度三个方面去衡量。

(二) 思想建党举措对党员的影响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治党历程中的宝贵历史经验,思想建党能够增强组织政治价值认同和政治精神吸引力。制度只有被党员从内心接受,才能激发内生动力,形成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状态,制度才能得到较好的执行,制度也才能发挥其凝聚共识的功能。

认同具有凝聚共识的功能,党员对制度治党的认同反映了党员对党的制度建设过程和建设成果的拥护和支持。“一种行为准则如果得不到执行,实际上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纸空文。”^[13]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党员才能将制度内化为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我们之所以遵守规则与法,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对捍卫自己的权利往往显得势单力薄,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利形成整体的力量才更能保障我们的权利和利益。”^[14]制度认同是人们在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制度认同能够满足人们的情感 and 价值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总是从一定的需要出发,形成反映需要的目的性意识,进而指导和推动实践活动,最终满足需要或实现目的。因此,制度认同内在包含着价值的肯定和转化为现实行为的趋势与

取向。^[15]

制度认同的形成,需要借助教育来实现。教育能够弥补强制“服从”的不足,帮助党员从认知上、情感上对制度治党隐含的理论、价值产生认同,使党员对制度治党的强制性顺从转化为自觉认同。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一个指向党员外线行为的规范,一个指向行为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上的思想领域的问题^[16]。党员的正确的态度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的,态度改变的实质是人的继续社会化。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制度的认可和接受^[17]。

(三)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连接点

认识到行为和思维不可分割^[18],从微观层面来讲,制度的有效性指的是制度对个体行为发生现实影响的效力,^[19]个体行为的变化经历了制度规范“内化”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个体在面对社会规范时,首先会采取依从的策略,即表面上接受规范并按照规范的要求来行动,但对规范的必要性或根据缺乏认识,甚至内心怀有抵触情绪。依从是规范内化的初级阶段,也是进一步内化的基础。其次,在进一步学习、了解规范的前提下,个体产生对规范的认同,在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上主动接受规范,并以群体中的“模范”“先进”为参照,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他人接近。第三个阶段,是社会规范内化的阶段,个体在思想观点上与社会规范要求完全一致,并将新习得的规范与自己原有观点、信念进行整合,最终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价值体系。^[20]在个体遵从制度规范的过程中,认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认同是情感、态度改变的前提,是个体价值内化的过程,而行为的改变是由内化而外化的终点。

制度的有效性在于遵从,党员对制度的遵从来源于两种力量——外部权威或内在认同;微观层面党员对制度的认同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作用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步推进、同向发力的作用在于引导党员对制度的“表面依从”转化为“内心真正的接受”,也就是从认同的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制度治党各项举措的全面推进,每个党组织中的党员获得了一种“新”的认知信念,并以这种信念评判组织、他人和自己并自发调整自身态度、行为的改变,这时所产生的态度改变是一种内化性的改变,完全不同于第一阶段的“表面”依从。内化性的态度改

变是一种新价值观的获得,是态度改变中的最深刻的层次。新建立的内化水平的态度,会成为个人整个态度与价值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内化了的态度已成为个人的态度,不再依赖外在压力及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它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态度,也是最为坚定的态度。个体品德是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因此,人的品德的形成也是社会规范及其价值原则内化的结果,经历了从外向内的转化过程。

从微观层面的党员个体来看,思想建党与制度

治党同向发力的关键在于人^[21],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有效性在于党员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改变。制度治党,是将党的信仰、理论、规矩和纪律等规范用具有约束力的“刚性”制度规范党员自觉践行;是被动的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再到主动的外化于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22]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并行,根本目的是要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党员的思想,使他们在正确态度的基础上表现出自觉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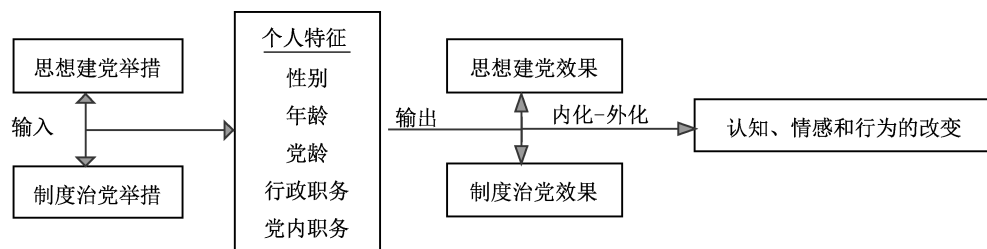


图1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分析框架

二、案例选取与数据收集

(一) 案例选取

2018年7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重大命题。在这一背景下,国有企业开启了以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治党探索,以党支部标准化制度建设工程为抓手,在对国有企业基层党支部工作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开启了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同向发力的探索。

表1 国有企业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基本举措

国有企业	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具体举措(例举)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政治要求具体化,党建责任清单化,组织生活常态化,党建经营一体化,群众工作多样化,考核评价体系化,制度流程显性化,党务工作模板化,党建工作信息化,基础保障科学化。	建立领导干部专题党课、专家骨干技术党课、普通党员微党课的“三级党课”制度。开展集体学习、主题党课、红色教育、民主议事、志愿服务、帮扶慰问等活动。
中交二航局	党建制度标准化,支部组织机构标准化,党建工作流程标准化,党建信息管理标准化,党建视觉识别系统标准化,党建活动载体标准化,党建考核考核及保障标准化。	项目党支部组建党建促安征迁办公室,设立党员服务点,设立“党建引领示范工点”,首创“党建引领 安全生产”主题党日活动,成立青年突击队,设立青年安全示范岗,为项目中心工作服务。
湖北烟草金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组织规范化,基本制度体系化,基本任务清单化,基础工作标准化,基础台账明晰化,基本保障长效化。	建设“党员之家”,落实党员思想动态分析制。每月召开“主题党日”活动,用好“学习强国”平台,利用红色教育基地资源,探索网络教育新模式。组织开展红旗支部等创建表彰活动,开展志愿服务、结对帮扶、政治生日等活动。
国家电网公司	组织建设标准化,活动阵地标准化,组织生活标准化,党员管理标准化,信息台账标准化。承上启下、沟通协调、统筹推进系统化工程建设。	完善党课学习、组织生活、联系群众、党日活动等各项制度,“思想建设”是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关键内容。
重庆烟草工业公司	工作经常化、制度规范化、内容系统化、管理信息化。	

注:以上资料摘自 CNKI 论文

在总体制度建设框架下,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贯彻落实公司总体设计,这些具体举措覆盖了党支部标准化和系统化建设的方

面面,通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实现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同步推进、同向发力。除了原有的“三会一课”所进行的党员思想理论教育以外,该企业还加

强了其他途径和方式的党员思想教育,如现场教学、志愿活动、影像学习、文件学习、经验分享和专家党课等形式。一方面,将党员思想教育日程、内容、效果评估制度化常态化,用制度治党落实思想建党;另一方面,加强党内法规学习教育,用思想建党的各项举措为制度的落实扫清障碍。可以说,在过去的两年中,企业高层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积极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时推进、同向发力。

(二)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的某国有企业有党支部 3 万多个,党员 60 多万人;2018 年以来,该企业自上而下地推动了企业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等一系列制度治党举措。颁布了《公司基层党支部工作规则(试行)》、《公司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指导手册》等相关制度,从党组织层面开启了五个标准化建设和三个系统化工程建设,旨在进一步明确公司党支部职责、规范党支部工作,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制度化建设落实到位、覆盖全面;促进支部基础管理更加规范、活动开展更加有序、作用发挥更加充分。同时,在制度治党各项举措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加强思想建党。

调研采取滚雪球的抽样方法。在该国有企业的党支部中随机抽取一个党支部,在这个党支部的微信工作群进行电子问卷的首次投放,并说明可以转发本企业的其他党员填答问卷。调查问卷收集历时 2 个月,总共收集到反馈问卷 1006 份,删除无效问卷

后保留了 877 份问卷进行分析,样本结构见表 2。

(三)调查工具开发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员信息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党龄、有无行政职务和是否担任党内职务;第二部分是制度治党效果测量,调查采用本文开发的《制度治党效果测量量表》。第三部分是思想建党效果调查,调查采用本文开发的《思想建党效果测量量表》。研究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确保量表信度和效度。

《思想建党效果测量量表》的初步测量量表中包含 30 个测量题目。研究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和直接 Oblimin 斜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特征值大于 1、因子载荷大于 0.4 为选取测量项目的标准,将 30 个题目归为三个因子,根据因子包含题目的意义,将三个因子命名为“获得感”、“融合度”和“价值感”。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 值=0.959(P<0.001),累计解释方差 72.810%。接下来进行信度检验,对信度系数(Cronbach. a)低于 0.7 的维度、删除此项信度系数 a 会增加的题目予以剔除。最终保留 3 个维度 20 个题目,3 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见表 1,整体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61。《制度治党效果测量量表》的初步测量量表中包含 7 个题目,最终保留了 6 个,KMO 值=0.872(P<0.001),解释方差 62.64%,整体量表信度为 0.872。

表 2 测量量表及其信度效度

一阶维度	二阶维度	题目个数	样题	信度系数	解释的方差%
思想建党效果	获得感	7	我更加理解了“两个维护”的含义	0.949	59.610
	融入感	6	我愿意将近期的思想动态告诉支部书记	0.911	7.767
	价值感	7	在工作中,我能够意识到我是一名党员	0.920	5.432
制度治党效果	/	6	我所在的党支部中,支部书记能带头遵守各项制度	0.872	62.64%

通过上述分析,说明两个量表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作为测量工具进行概念测量。问卷调查采用李克特 5 级尺度测量,请被试对题目描述的含义进行打分,赞同程度从 1 到 5,1 代表赞同度最低,5 代表赞同度最高。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党员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评价

分析表明(见表 3 及图二),被调查党员对制度治党效果的评价较高(均值 4.80,标准差 0.40),对思想建党效果的评价略低于对制度治党效果的评价(均值 4.78,标准差 0.37)。说明该国有企业在过去一年采取的以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的思想

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举措得到了广大党员的认可。

进一步,研究分别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群体党员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效果的评价,分析摘要见表 3 及图三-图七。分析表明,性别和党内职务对制度治党效果的评价有显著影响,男性党员和担任党内职务的党员对制度治党的评价显著高;年龄、党龄和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对制度治党的评价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党龄和是否担任党内职务对思想建党效果的评价有显著影响,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对思想建党效果的评价没有显著影响;男性党员、70 后党员、20-29 年党龄党员和担任党内职务的党员对思想建党的效果显著高。

表3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效果的基本状况

类别	n(人)	占比%	思想建党效果			制度治党效果		
			M	SD	检验	M	SD	检验
整体	877		4.78	0.37		4.80	0.40	
性别	男性	695	79.2	4.82	$t=2.68^{**}$	4.80	0.37	$t=2.45^{*}$
	女性	182	20.8	4.72		4.71	0.48	
年龄段(岁)	90后	251	28.6	4.73	$F=5.18^{**}$	4.75	0.47	$F=1.17$
	80后	258	29.4	4.80		4.78	0.38	
	70后	228	26.0	4.86		4.81	0.34	
	60后	138	15.7	4.83		4.81	0.35	
	1-10	457	52.1	4.78		4.78	0.42	
党龄(年)	10-19	274	31.2	4.80	$F=3.09^{*}$	4.75	0.40	$F=2.16$
	20-29	129	14.7	4.89		4.86	0.28	
	30-39	17	1.9	4.78		4.83	0.46	
行政职务	有	553	63.1	4.79	$t=-0.77$	4.77	0.42	$t=-0.56$
	无	324	36.9	4.81		4.79	0.39	
党内任职	有	445	50.7	4.85	$t=4.23^{***}$	4.82	0.33	$t=2.57^{*}$
	无	431	49.1	4.75		4.75	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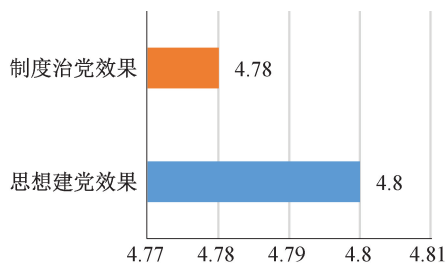


图2 总体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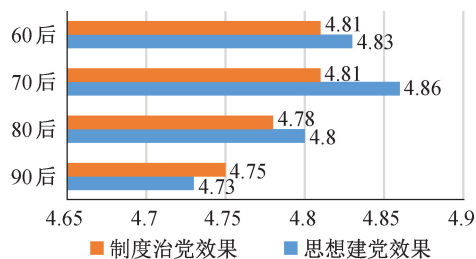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年龄段党员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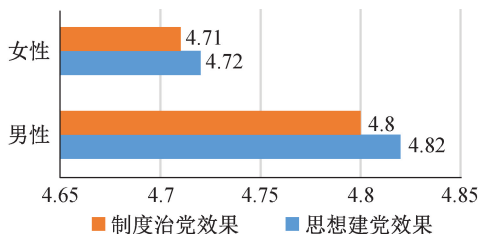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性别党员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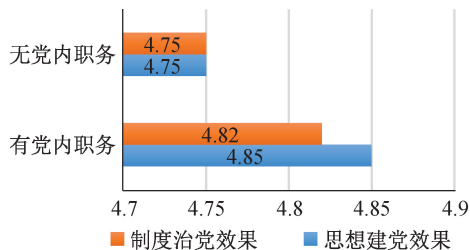


图6 是否担任党内职务对效果评价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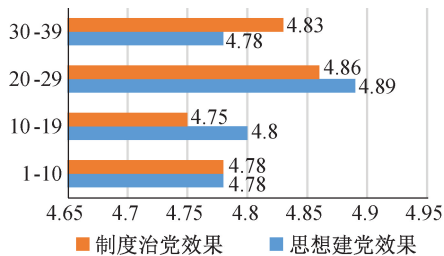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党龄的党员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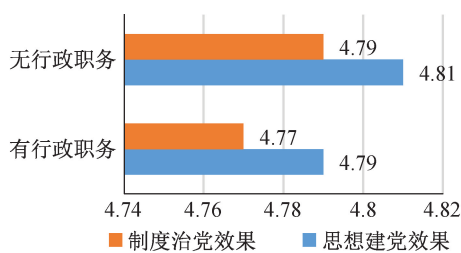


图7 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对效果评价的影响

(二)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相关性

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度量思想建党效果与制度治党效果的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是介于-1与1之间的数字,1表示两个变量完全正相关,0

表示无关,-1表示完全负相关。从分析来看,思想建党的效果与制度治党的效果强正相关,这说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党员对思想建党效果的高度肯定也会同时产生对制度治党效果的高度评

价,反之亦然。

表 4 思想建党效果与制度治党效果相关性分析

	思想建党效果	制度治党效果
思想建党效果	1	0.895**
制度治党效果	0.895**	1

四、研究结论和研究不足

(一) 本文开发的测量量表信效度均可,可为后续研究使用

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对《思想建党效果测量量表》和《制度治党效果测量效果》的信度和效果进行了检验,分析表明,这两个量表的信度和效果尚可,都可以作为工具供后续研究使用。《思想建党效果测量量表》包含三个分量表,“获得感”、“融合度”和“价值感”,量表累计解释度方差 72.81%,整体信度系数为 0.961。《制度治党效果测量量表》包含 6 个题目,累计解释方差 62.64%,整体量表信度系数为 0.872。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只局限于某一个行业的国有企业,为了进一步提高量表的可信度,可以进行再测,一方面通过丰富样本,提出适用性更广泛的测量量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该国有企业进行不同时间段的再测,以检验量表的重测信效度。

(二) 被调研国有企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举措得到了党员的认可

该国有企业所进行的以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举措得到了广大党员的认可。但具体到不同群体,党员的评价有差异。性别和党内职务对制度治党效果的评价有显著影响,男性党员和担任党内职务的党员对制度治党的评价显著高;年龄、党龄和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对制度治党的评价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党龄和是否担任党内职务对思想建党效果的评价有显著影响,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对思想建党效果的评价没有显著影响;男性党员、70 后党员、20-29 年党龄党员和担任党内职务的党员对思想建党的效果显著高。

鉴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建议,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具体举措可以针对不同群体党员进行有差别的活动。在组织活动时,可以适当考虑性别、党龄、年龄和是否担任党内职务这些差异。而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并不影响党员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评价;因此,一方面可以要求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员和未担任行政职务的党

员一样,无差别的参加组织生活和活动;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要求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员进一步加强学习。

(三) 被调研国企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研究表明,思想建党的效果与制度治党的效果强正相关;这说明,被调研企业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做到同步共举的同时,也能够同向发力并产生较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加强了党的制度建设,各项党内法规纷纷出台,管党治党有了依据。但正如总书记所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要同步共举、同向发力,才能对党员干部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帮助党员干部朝着党中央的要求改变各自的行为方式,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群体行为模式和组织文化。

参考文献

[1] 唐阳阳,廖先明.新时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以之江学院中旅(旅游)学院学生党支部为例[J]. 改革与开放,2018(12):52-53.

[2] 沈晓艳,邵小芳,陈栋东.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对甘肃省党校系统的考察[J]. 发展,2019(7):24-26PHam.

[3] 龚晨.大力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基于广西贺州样本的调查[J]. 领导之友(理论版)2017(2上):58-63.

[4] 郝儒杰,许敏,郝亮城.坚持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从严治党——四川某国企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调查研究[J]. 南方论刊,2015(11):44-46.

[5] 李斌雄,廖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实施探讨[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0):95-108.

[6] 李斌雄,廖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实施探讨[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0):95-108.

[7] 陈松友,刘帅.制度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性及路径选择[J]. 河南社会科学,2016,(5):32-36.

[8] Black J,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Naturalism in Socio-Legal Analysis: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o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J]. Law & Policy, 1997, (19):51-93.

[9] 晏功明.制度设计与社会核心价值再造——西方思想传统中制度设计思想探析[J]. 理论界,2016,(3):26-34.

[10] [美]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8.

[11] 王立峰,吕永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制度治党的现实梗阻与发展进路[J]. 河南社会科学,2017,(7):46-52.

[12] Yuan L, Chen X. Managerial Learning and New Product

- Innovativeness in High-Tech Industries: Curvilinear Effect and the Role of Multilevel Institutional Support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5, 50(1):1-9.
- [13][美]F. J. 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25-32.
- [14]林振林, 马起. 从规则到行为:试论我们为何守法[J]. *政法学刊*, 2010, (4):93-98. PHam.
- [15]秦国民. 政治稳定视角下制度认同的建构[J]. *河南社会科学*, 2010, (1):112-114.
-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80-117.
- [17]孔德永. 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J]. *齐鲁学刊*, 2006, (5):28-30.
- [18][美]社会心理学(第12版)[M]. 罗伯特 A. 巴隆. (美) 尼拉 R. 布兰斯科姆; 唐 R. 伯恩, 邹智敏等译, 侯玉波审校,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9.
- [19]冯务中. 制度有效性理论论纲[J]. *理论与改革*, 2005, (5):15-19.
- [20]金盛华. 社会心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20-36.
- [21]李慎明. 关键在人还是关键在制度及体制机制? ——学习习近平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关论述的体会[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7(5):5-16.
- [2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141.
- [责任编辑 王云江]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al party governance work in the same direction ——Take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party branches as an example

HE Li¹, ZHANG Ya-ru²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inhang 200240, China;
2. Shanxi University of Administration, Xi'an 710067,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system governance are the core of the party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two forces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t the level of "what should b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a party branch promoted by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as a case, and focuses on the "real" level of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system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and for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is paper develops a measuring scale for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system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the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system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model of individual cognition-emotion-behavior of party member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arty members have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for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system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asic-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ifferent gender, age, party age,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hold an internal party position have a helpful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evaluation. Holding an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evaluation of party members. The study uses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to verify that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system governance are synchronized and exer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system governing the party; effectiveness; interaction; empirical research